

中国历史地理学的渊源和发展

中国历史地理学在我国是一门既古老而又年轻的科学。说它古老是因为它有悠久的渊源，可以上溯两千多年以前。那时当然还没有现在这个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名称，而是作为历史学范畴中的地理学，逐渐由附庸成为大国。说它年轻是因为建国以后，它在旧有的基础上增加了新的因素，其中有一点乃是它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有了这样一些新的因素，才使它以崭新的姿态成为现代的科学。探索其渊源所自和发展的历程，使这门古老而又年轻的科学不断得到充实，这在当前不是毫无意义的事情。

一、早期的历史学范畴中的地理学

人和地的关系在远古时期就已经受到重视。人不

能离开自然，也就不能不受到自然的制约和影响。为了能够不断生存下去，人就不能不从事利用自然并进一步改造自然。人最初开始生产劳动，就是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的发端。那时对于居住地址的选择，显然是经过悉心筹划的。在凿井技术尚未发明之前，人为了饮水就不能远离大河小川，可是一旦河水上涨，却使人不能过分靠近水边。现在发现的那时的文化遗址大多是在河畔的阶地之上。这差不多已成为那时人选择居住地址的一个规律。因为这样既便于取水，又利于防水，如果违背了这个规律，必然会招致若干的困难，甚至还会遭遇更大的灾害。这自然只是一个例证。其他若干事物也都可以作为证明，人不能离开地，也不能离开自然，其间的关系就不能不受到重视。这种重视还会长期延续下去，成为传统的习惯。

这种有关人与地的关系的规律的发现还只能是属于自发的，是相当长期为了趋利避害的结果。由于时代的推演，这种关系受到更多的重视，这已经由一般的传说交流而见诸文献的记载。这里可以提出两种比较早期的文献的记载，就是《禹贡》和《周礼》。《禹贡》述九州，着眼于山川、丘陵、原隰和土壤、物产。《周礼》的夏官，有司险一职，掌九州之图，为的是要周知山林川泽之阻，以达其道路。而地官司徒一职，则以天下土地之图，周知九州之地域广轮之数，辨其山林、川泽、丘陵、坟衍、原隰之名物。像这些自然的要素都有专门的人去职掌，可见那时重视的一斑。《禹贡》为战国时的著作，这在现在已经是了无疑义的。《周礼》所论述的官制，自然也难于就可认为是周一代的政治制度。但至少可以显示那时的人对于人地关系的重视，对于一些自然事物不能等闲置之的态度。像这样的记载，在《左传》一书中也还不少。襄二

十五年，楚国蒯掩书土地的所宜，就曾经“度山林，鸠薮泽，辨京陵，表淳卤，数疆潦，规偃潴，町原防，牧隰皋，井沃衍”，然后“量入修赋”。这里所说的山林，自是指山林之材；泽薮乃是湖泊；京陵则是很高的大阜；淳卤为埆薄之地；疆潦为疆界有水潦的地方；偃潴是下湿之地；原为高平之地，防为堤防，这里二字连言，则是堤防间的高地；水岸下湿为隰皋，平美之地为沃衍，总的说来，大都是不同的地形。对于不同的地形要讲究利用和改造，就不能不专门下一定的功夫。

这里所提到的几种有关的文献，都是儒家的经典。它们并非地理学的著作，其中所记载的地理现象和有关的事物，只是相应的涉及而已，初非专门的著述。《禹贡》所记载的相当广泛，应该是一部地理著作了，可是它的撰述目的却是为了阐明统治大一统国家的方式和方法。《左传》还是有关春秋史事的著作，《禹贡》的撰述则已到了战国时期。这就是说，人和地的关系在那些时期虽早已受到重视，而且还能见之于记载，但作为一门学科来说，在分枝并不甚多的若干学科之中，还难得居有相当的地位。

地理学的建立应该肇始于东汉班固时。班固著《汉书》，于十志之中明确地提出了《地理志》。这不仅首先使用地理这个名称，而且《志》中也确实记载了若干不同的地理现象和有关的事物，这是切合当时实际的记载。论所记载的项目是和《禹贡》有所出入的。虽有出入却还显得一脉相承。可以说这样的记载自《禹贡》始肇其端倪，到《汉书·地理志》就已经近于具体。当然这不是说《汉书·地理志》所记载的已经囊括全局，包罗无遗。实际上以后的继承者仍然各有较大的增损，并非前后都是一律。说地理学的建立始于《汉书·地理志》，

而不始于《禹贡》，这不仅是因为班固首先使用《地理志》这个名称，而是明白无误地记载着一代的地理现象和有关事物。

《禹贡》却不是如此。《禹贡》虽也记载了一些地理现象和有关的事物，却自有著作的目的，而不是为了撰写成地理著作。

如果说地理学在班固时已经成一个体系，可以和其同时的别的学科一样，并驾齐驱，那却也未必。《汉书·地理志》诚然记载着相当多的地理现象和有关的事物，也注意到人和地的关系，不过没有更多阐明。这不是苛责于班固，因为如前所说，至迟《春秋左氏传》中在这方面已经有了相当的基础，甚至所阐明的比较《汉书·地理志》还不见得少到什么地方。班固的《汉书》可以比肩于司马迁的《史记》。可是《河渠书》和《货殖列传》所阐明的似乎还稍多一些。

实际上说来，忖度班固的意思，并没有把地理学抬高到和当世其他显学居有同等的地位。在《汉书》中，《艺文志》同样为脍炙人口的名篇，这虽是采撮刘向歆父子《七略》的旧规，班固却也曾费过斟酌，即所谓“今删其要，以备篇籍”。他省去了兵家六篇，而入三家五十篇，可见并不完全是刘向歆父子的原貌。可是这篇《艺文志》中，就没有地理学的地位。班固自己的著作，自然不能列入其内，其他更无别的著录。当然可以说是时无作者，就难免无书无目，不能以此而对班固有所非议。再往后说，《艺文志》这样的篇目几乎成了绝作，直到唐人撰前五代史，才在《隋书》中增添了一篇《经籍志》。唐人这篇著作并非无所依傍，而是在荀勖、李充、王俭、阮孝绪诸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经籍志》以四部分类，与《艺文志》的七略迥异。虽有如此改革，地理学也并没有占到重要的地位，却还是和以前一样的。《汉书·艺文志》

撰述时，还可推诿当时没有地理名家，难得有著作著录。由两汉迄于隋时却并不是如此。这一期间，有关地理的撰著前后相望，代不乏人。据《隋志》所著录的就有一百三十九部、一千四百三十二卷之多。至于象《三辅决录》和各地的先贤传、耆旧传之类，则另入《杂传》之中，不在《地理志》内。其实这倒没有可以诧异的地方。这里可以提出的，是这一百三十余部的地理书，只是作为史部的一个类别而见于著录的。这样的著录决定了千数百年的地理学的地位。明白地说：当时的地理学只是史学的一个门类，居于附庸的位置。

这样的位置并非出于某些人对于地理学的好恶，而是决定于地理学本身的发展。如前所说，地理学应该阐述人与地的关系。这本来是自有人的从事生产劳动以后的必然的归宿。那时虽然还没有地理学这个学科的名称，如果循序发展，并不是不可能达到新的境界。过多的记载地理现象和有关的事物，遂使人与地的关系的阐述未能彰明显著，甚至难于更多地向这方面发展。

地理现象是自然昭示于人的。在人最初从事生产劳动以后，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也是必然的发展，地理学的著作中，不仅记载地理现象，也应该记载人在这方面的成就。事实也是如此。这在《禹贡》中本来就已经体现出来，《禹贡》在山川、丘陵、原隰、土壤之外，也记载着道路、物产、田地和部落。然而更重要的则是九州的区划。九州制度虽是某些人的理想，却是利用自然的一种成果。如何划分九州？自然和山川形势有关。若不是山川形势了然于心目之中，九州也是难得区划出来的。

这种于记载自然的地理现象之外，兼记载人的利用自然和

改造自然的方式和成就，到班固的《汉书·地理志》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扩大。从此以后，作者前后相继，论述的范围或涉及全国，或仅限于地区，记载的项目虽间有出入，繁简亦容或有所差异，大体都是秉承班固的旧规，没有新的突破。他们所记载的，不论其为地理现象，或是人为设施，都和人的社会活动有关，其间来由和委曲，往往也非短促时期所可了结。山脉丘陵一般是少有变化的，但有的名称也许会因时而有改动。河流溪涧就与山脉丘陵不尽相同。有的河道难免有所变化。有的变化也许相当频繁，甚至竟然成为经常性的。这些纯为自然的地理现象还是如此，至于人为的设施当然更是有所变化的。前面说过，疆域区域是和山川形势有关，其他的关系也还不能尽免。不论出于何种因素，其间也难免有所改革。其他如古城的位置以及战争的场所，更与人的社会关系相当密切。历史载籍和历史学本是记载和研究人的社会关系的。人的社会关系不能和地理迥然无关。而了解了有关的地理变化，对于记载和研究历史会有相当大的助力，而不能绝然分开。地理学能够在早期的历史学的范畴中形成和发展也就不是没有原因的。说到发展，这是事物应有的过程。不过地理学的发展在以前悠长时期中却显得相当缓慢。如前所说，由于地理学在早期的历史学范畴中形成不是那么过早，所以在刘向歆父子所撰的《七略》中还未能居有一定的地位。后来在《隋书·经籍志》的四部中仅居于史部的地理类一个类目。四部分类的使用相当长久，清人所撰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较诸隋唐诸史的经籍志和艺文志影响皆大，而时代又最后，地理学的著作在其中的位置仍未有所变更，依旧为史部的一类。这不是这些撰修人士的泥古不化，而是这样的地理学没有更多的发展。

二、改造自然和利用自然的途径的寻求和总结

上面已经提到：在早期的历史学范畴中的地理学尚未形成之前，在一些著作中就已经对所认识的自然有所记载。这样的地理学形成之后，这种记载就逐渐趋于繁多。这显示着对于自然的认识日益增长和普遍。人对于自然不仅要认识，更重要的是在于利用和改造。前面提到春秋时楚国芮掩书土地之所宜，已经不限于认识不同的地形，而是要讲究利用和改造。对于山林之材就是要加以度量，使之能够供应国家的用度。对于可以汇成泽薮的田间水流，必须把它鸠聚起来，空出土地，作为田猎的场所。对于那些很高的丘陵，也要辨别清楚，因为这样的地方只好作为墓地。对于那些瘠薄之地，就要特加表异，以作为减轻赋税的根据。至于那些有水潦的地方，同样也要计算清楚，减轻它的税收。对于那些下湿的地方要规定它能受水多少，以便田中余水可以有所排除。至于原隰间的面积不大的高地，更要作好田畔的畦埒，以免受到来往行人的践踏。那些水岸下湿的地方，不可以耕种，不妨辟为放牧的场所。剩下平美衍沃可以耕种的良田，自然要以之作为井田，期望取得更多的收成。

芮掩的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的措施，在春秋时期已经算是相当典型了，战国时期的《禹贡》在这一方面，论规模却远为宏大，措施也更为具体。《禹贡》是为了治理可能行将实现的大一统的国家而设计的蓝图。为了能够更好的发挥治理作用，它对于自然的地理现象有了相当深刻认识和了解，这是在前面已经论述了的。然而更为饶有意义的，则在利用和改造方面。

它不仅在寻求利用和改造自然的途径，甚至已经达到总结利用和改造自然的贡献。如何治理这个可能行将来临的国家呢？首先应使各地都能够联系起来。未来的国家应有一个都城，全国各地都应围绕这个都城而发挥其向心力的作用。根据原作者的规划，这样的国家将有一个规模宏大的交通网。由于水运较陆运便捷省力，这个交通网应是一个围绕都城的水道交通网。规划这样的交通网有其容易致力的地方，也有不易克服的难点。这在所论述的豫州和梁州可以体现出来。所说的豫州乃在黄河和荆山之间，这是说有今河南和湖北两省大部分的土地。这里有汉江流贯，可是汉江乃是向东南流去，和它所设计的都城不仅相去过远，而且方向相反。这个州由南往北流的河流只有一条洛河。于是洛河就成为规划中的交通网的组成段落。这样就可以说是利用了。然而梁州却还要困难。梁州为今四川省地，梁州诚然有长江及其若干支流，这和豫州的汉江一样，都是流向东南，对于所设计的都城说来，同样是愈流愈远，难以利用得上。可是《禹贡》的作者却规划出大体以水道为主的交通路线，就是所谓“浮于潜，逾于沔、入于渭、乱于河”的道路。这是说由梁州到当时的都城，要由潜水越过巴山到沔水，再由沔水越过秦岭到渭河，然后再由渭河到黄河，进入黄河就可达到都城。这条道路上虽说是有巴山、秦岭，还是可以尽量利用水道。就是这条道路上当时还添上一段支线，即所谓“西倾因桓是来”。西倾山在今青海省东南黄河侧畔，桓水则是今白龙江。由西倾山顺白龙江而下。自龙江入于嘉陵江，而嘉陵江就是所谓潜水。可见当时是想方设法用水上交通。《禹贡》的作者撰著的目的，是为了抒发治理国家的理想。为了抒发这样的理想，因而就寻求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的途径。这不仅见之于

水道交通网的规划，整篇《禹贡》都可显示出这样的精神。如果说《禹贡》一书是当时人利用和改造自然的总结，谅不为过。如前所说，战国时期地理学还没有能够建立起来。虽说那时还未能有所建立，象《禹贡》一书这样的探求对自然的认识，并从而加以记载，又进而寻求利用和改造自然的途径，最后还对于利用和改造自然的贡献作了总结，这是建立地理学的先行者。对于以后的建立地理学是有一定促进的。

这种寻求利用和改造自然的途径并加以总结的精神，继续得到发扬。司马迁《史记》的《货殖列传》，自来不以之作为地理著作，实际上却充分显示出这种精神。《货殖列传》说：

“山西饶材、竹、穀、~~𦵏~~、旄、玉石；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江南多出楠、梓、姜、桂、金、锡、连、丹沙、犀、玳瑁、珠玕、齿、革；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这虽是简短几句话，却是当世的经济区划的蓝图。按照所说，这个经济区划的蓝图一共分为四个部分，各部分都各有其特点，不是对于当世经济了然于胸际，是难以制定出来的。这里所说的山西和山东是以崤山为分界的。崤山在今河南省灵宝、陕县境，是秦岭向东延伸的部分。有名的函谷关就在崤山上，函谷关是战国时期秦国和关东诸国分界处。作为政治和军事的要地，在秦汉时期仍有它的重要意义。江南是指长江以南，这是用不着说明的。这里所说的龙门，乃指今山西河津县和陕西韩城市间横于黄河两岸的龙门山。而碣石山则在今河北省昌黎县境。所谓龙门碣石北，乃是由龙门至碣石一线以北各地。这条龙门碣石线经过今北京、太原以北，吕梁山脉的南端。在当时这是一条农牧业的分界线。这条分界线之北是畜牧区域，故其地多马牛等畜产。

这个经济区划当不是司马迁随意划分出来的，而是相当长久时期全国有关方面寻求利用和改造自然的结果。在农业区域和畜牧区域之间本来是应该有一条分界线的。这条分界线却因为人为的原因而未能稳定下来。司马迁所说的这一条分界线也只是他这一时期所显现的，以后还在变化中。在此以前的分界线乃远在其南，至少汾河中游都应该在其北边，更不要说太原附近各地了。这条分界线往北推移，就不仅限于利用自然，而是改造自然。因为这样就把相当多的畜牧区域改造为农业区域了。以长江划分南北，这和现在的秦岭淮河一线是不相同的。这可以说现在划分自然地区的一些条件不为那时的人所知。不过在当时人看来，江南是和中原不相同的。不仅气候物产不同，就连土壤也比不上黄河流域的肥沃。司马迁所说的山西、山东这两个地区的概念是和现在迥然不同的。但以崤山分东西却不是只有司马迁这一时代才有的，而是沿用了相当长的时期。因而司马迁以之作为经济地区的一条分界线，并不足以为奇。这几条分界线是当时及其以前长时期经人们寻求探索出来的。这是那时的人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贡献，也是司马迁总结出来的成就。

这四个经济地区只是有关当时全国的区划，一些地区还会各自成为较为狭小的经济地区。在这较为狭小的经济地区，同样也可显示出当时的人在寻求利用和改造自然的途径。这样较为狭小的经济地区在当时是有相当数目的，关中就是其中之一。司马迁论述关中，说是其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司马迁对于这样现象的形成，总结了两点：一是土地肥沃，一是交通便利。由于土地肥沃，故农业一直发达。交通便利，商业也相当兴盛。关中不仅以褒斜道

缩穀巴蜀，而且也居于陇西各地的要道，关中先后有几个都城，无论是雍和栎阳，还是咸阳和长安，都能使“四方辐凑，并至而会”。土地肥沃，又有便利的交通条件，这是自然地理本来的现象，惟其能够利用和改造，所以那时的关中就显得特别富庶。司马迁这样论述，确是接近于地理学。可是《货殖列传》究竟还是《史记》的一篇，而且他也没有正式提出地理这个名称，所以地理学的建立还要向后推移。

班固所撰的《地理志》，不仅远绍《禹贡》，而且也上承《货殖列传》。甚至它的《后序》的文字段落都采摭自《货殖列传》。这样的采摭是合乎当时行文习惯的，初无损于班固的令誉。班固采摭了《货殖列传》，却不囿于《货殖列传》。

《地理志·后序》也和《货殖列传》一样，划分全国为若干地区，而略有出入。不过所论述的并非仅限于经济，政治、文化以及风俗等亦在其列。当然所说的政治、文化、风俗等的表现也是和地理有关的。班固于此举出了富庶的地区，也未遗漏了贫瘠的地区。郑国的“土狭而险，山居谷汲”，赵、中山的“地薄人众”，鲁国的“地狭民众”，宋国山阳的“地薄民贫”，都受到注意。对于这些贫瘠的土地，有的就未能设法改造，因而影响到风俗的浇薄。譬如赵国，就“丈夫相聚游戏，悲歌忼慨，起则椎剽掘冢，作奸巧，多弄物，为倡优。女子弹弦跕躑，游媚富贵，徧诸侯之后宫”。鲁国虽然也是“地狭民众”，却“颇有桑麻之业”，其“俗俭啬爱财，趋商贾，好訾毁，多巧伪，丧葬之礼文备实寡”，可是“好学犹愈于它俗”。显然能否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会有不同结果。这样的总结是合乎各地区的实际情况的。如果能推而广之，可能会取得一定的影响。可惜以后再未多见与此有关的记载，难知其

究竟。说不定是由于地理之学尚属初创，还不易引起一般人的注意。

在这一方面致力最多的应该数北魏的酈道元。《水经注》虽以注《水经》得名，实为千古绝作。《水经》志水，只有一百三十七条，《水经注》却增加到一千二百五十二条。几乎达到有水必录的程度。这是对于认识自然的记载。水和人的关系至为密切，人是不能离开水的。人能善于利用，就可得到水利；不善利用，或防患未及，就难免受到灾害。正因为这样，酈道元对于前代和当世的水利事业，靡不详为征引备录，认为这是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的途径。黄河流经砥柱，自来为运道必经之地，而水道险阻，行者视为畏途。象《河水注》所说的：“虽世代加工，水流湍湑，涛波尚屯。及其商舟是次，鲜不踟蹰难济”。这显然是需要继续改造的。不过象东汉初年打算利用滹沱河的水道，转山东的漕粮，再由汾河漕到太原。从表面看来，这确是一条捷径，本应是对自然的很好利用。但是这条水道却相当艰苦，转运所经凡三百八十九隘，因而苦役连年，死者无算，终于废止。酈道元在《汾水注》中特加记载。这不是说不应该对自然从事改造，若为现实条件所不许，空言改造，不惟无益，反会有害。酈道元还记载了许多自然的变化。自然的变化不一定是受到人为的影响，但还是会影响到人对于自然的利用。现在北京城南的永定河，那时称为灋水。灋水在这里会合高粱河，而分出清泉河。高粱河“微涓浅薄，才足津通，凭借涓流，方成川隄”。而清泉河下游，“所在枝分，更为微津，散漫难寻”。这是两条特殊的河流，如何利用？须善为处理。故《灋水注》引俗谚说：“高粱无上源，清泉无下尾”。酈道元还在《伊水注》中，特别记载伊阙左壁的

石铭，说是黄初四年六月二十四日辛巳，大出水，举高四丈五尺，齐此已下。这样的自然变化，不仅对于当时趋避水患有关，就是对于现在研究水文变化，也是一条珍贵的材料。

酈道元这样的致力，显然使地理学达到一个较高的高峰，使当时治此学者难以企及。就在后世也是等闲不易超过的。虽然如此，这样的致力还是符合于地理学的寻求利用和改造自然途径的要求，并促成它继续发展的。因此，后来的作者还是代不乏人，也不是就没有名家的。唐时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图志》，宋时乐史的《太平寰宇记》以及清代顾祖禹的《读史方輿纪要》都是值得提到的著作，也是各有所长的。

三、沿革地理学的肇始和发展

沿革地理学本为地理学的一个部分。这在早期的历史学范畴中的地理学亦是如此。前面说过，地理学的肇始乃在《禹贡》之后，《禹贡》从其撰述的目的说，也不拘泥于地理书。可是《禹贡》之中却讲了许多地理，而且所讲的地理都可说是和沿革地理学无关。这其中的道理本来也是很明白的。

沿革地理学的肇始也应追溯到班固的《汉书·地理志》。

《地理志》叙述汉时的百三郡国，一一追溯其原委，不仅追溯到汉初，而是追溯到秦时。郡国之下的县邑乡聚还追溯得更远，不以秦时为限。如京兆尹的郑县，其先为周宣王弟郑桓公之邑，而杜陵亦为故杜伯国。河东郡的安邑，本是春秋时魏绛旧都，而梁惠王亦曾以此为都。右扶风枸邑的豳乡，则为《诗经》所咏的豳国。河东郡大阳的吴城，又为周武王时大伯后裔的封国。这样说来，是不是沿革地理学就已相当于早期的历史

学范畴中的地理学呢？那却未必。早期的地理学虽属于历史学范畴之中，可是还要探索人与地的关系。前面已经说过，《汉书·地理志·后序》曾采撷《史记·货殖列传》的语句，对于人与地的关系亦曾有所论述，不过不如司马迁所说的深邃。

《汉书·地理志》虽冶两者于一炉，其间的分野却是相当明白的。沿革地理学实际上就是考核一地的因袭废省，和人与地的关系初无干涉，固不能混之为一。

班固虽肇始建立地理学，但他究竟是一位史学家，而《汉书》又是一部重要的史书，所以对于其以后的修史就有影响。所谓纪传体的正史中的《地理志》、《州郡志》、《地形志》，名称虽稍有差异，莫不祖绍班书，竞述沿革。有的只论本朝，有的则远征前代。刘宋承东晋之后，黄河流域早沦为十六国起伏之地，版图已告蹙缩，复杂有相当繁多的侨州郡县，职方所掌颇感困难。故沈约著《宋书·州郡志》说：“地理参差，其详难举。实由名号骤易，境土屡分，或一郡一县割成四五，四五之中亟有离合。千回百改，巧历不算，寻校推求，未易精悉”。就这样难于定论之际，远要追溯往昔，至于秦汉之时。所以沈约接着又说：“今以班固、马彪二《志》，《太康》、《元康》定户，王隐《地道》，晋世《起居》，《永初郡国》，何徐《州郡》及地理杂书，互相考覆。且三国无志，事出帝纪，虽立郡时见，而置县不书。今唯以《续汉郡国》，校《太康地志》，参伍异同，用相征验。自汉至宋，郡县无移改者，则注云汉旧。其有回徙，随源甄别。若唯云某者，则前此皆有也。若不注置立，史阙也”。沈约《州郡志》既为《宋书》一篇，循名责实，自应以刘宋一代为主。可是竟越俎代庖，远论前代。三国无志，固犹可说。前后两汉，自有班固及

司马彪两志，而此两志又复详瞻确实，何劳一一并举，并且还上及于嬴秦。多费篇幅，文涉繁琐。然六七百年间，建置省并，历历如绘，可以一目了然，其功有足多者。其后各史地志，虽无沈书的详瞻，一代沿革还都能条理清晰，博览境域的分合者，实可多所取资。

纪传体的所谓正史中的《地理志》及有关志书，诚然是沿革地理学的著作，其实这些只是沿革地理学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则当于纪传体所谓正史中的地理志以外的地理书求之。早期的地理书虽属于历史学的范畴，作者还是众多的。尤其是东汉以下历魏晋南北朝的作者就已不少，据《隋书·经籍志》所载，南齐陆澄曾经合《山海经》以下一百六十家的地理著作，编成《地理书》一百四十九卷。后来到梁时，任昉又增添了八十四家，编成《地记》二百五十二卷，数目是相当繁多的。陆任以后，作者还不断增多。唐初撰《隋书·经籍志》，合陆、任两家所编的见存者，再加上其后的著述，犹著录了一百三十九部，一千四百三十二卷。就是这一百三十九部，到现在亡佚的已不在少数。清人王谟曾辑有《汉唐地理书钞》，陈运溶也曾作过辑佚工夫，见所刻的《麓山精舍丛书》中。这些书中当然有些并非专讲沿革地理学的著作，不过涉及沿革地理学的确也不在少数。举其著者，如京相璠的《春秋土地名》，应劭的《地理风俗记》，不必探求其内容，仅就书名亦可略见一斑。乐资的《九州要记》，阚骠的《十三州志》，黄恭的《十四州记》皆为一时全国的总志，也皆无例外地从事沿革地理的叙述。至于专记某一区域的地理书，如陆广微的《吴地记》，山谦之的《丹阳记》，盛弘之的《荆州记》以及《辛氏三秦记》，更是原原本本记载一地的沿革。这类区域地理书，现在

大致可以考见的无虑三数十种，大体都是相仿佛的。然而更有甚者，如沈约在《宋书·州郡志》中所征引的《太康地记》、《元康地记》和《永初山川记》，所涉及的时期都很为短促。太康为晋武帝年号，前后只有十年。元康为晋惠帝年号，前后也只有九年。永初为刘宋武帝年号，历时更短，仅仅只有三年，这些《地记》和《山川记》既以年代为书名，自应就涉及的年月立论，可是从现存辑本中看到的并非仅限于此，而是不厌其详，同样追溯既往。《太康地记》、《元康地记》、《永初山川记》还是如此，就不必苛求论述有宋一代历年六十的《宋书·州郡志》了。

此风历经扇扬，推波助澜，可以使人感到后来居上。唐时魏王泰属下文士所撰的《括地志》及贾耽所撰的《郡国县道记》，在当时都属于名作。虽久已失传，就辑佚本可以看见其论述体例竟和沈约的著作差相仿佛。现存的唐宋两代卷帙浩繁的两部地理书，即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图志》和乐史的《太平寰宇记》亦皆未能免俗。李吉甫自言其书重在“丘壤山川，攻守利害”。清嘉庆年间孙星衍为此书刊本作序，却称道它“载州郡、都城、山川、冢墓，皆本古书，合于经证，无不根之说，诚一代之钜制，古今地理书赖有此以笺经注史，此其所以长也”。可见讲沿革还是其中的重要部分。乐史自序其书，曾讥贾耽、李吉甫为漏阙，故采摭繁富，以赅博自赏，然其体例大体仍依李吉甫的旧规。乐史自所增添的，则为人物、艺文等部分。这虽是后来各家方志所多遵从的规范，作为地理载籍，则未免失之于冗杂。《元和郡县图志》和《太平寰宇记》既同唐宋时期地理钜著，而《太平寰宇记》的体例除小有增损外，实未轶出《元和郡县图志》的范围，这就对以后的撰述多有影

响。王存等所撰的《元丰九城志》，欧阳忞的《舆地广记》，王象之的《舆地纪胜》，祝穆的《方舆胜览》，虽各有其特色，然于沿革却皆未尝疏略。欧阳忞的书，前三卷先叙历代疆域，自尧舜以至五代，皆在论述之列。第四卷则专载宋时郡县名称，五卷以后，乃备载宋朝郡县沿革离合，确是昭昭显著的。

作为沿革地理学，不能不一提及元、明、清三朝的《一统志》。岳璘等所修的《大元一统志》，共为一千卷，于地理书中最称繁博。惜其书久已散佚，无从窥其全豹。然从其残本中亦可略见其体例。其书虽网罗山川、古迹、形势、人物、风俗、土产之类，于古今建置沿革，尤称详备。明人修《大明一统志》时，犹得以此书为蓝本。《大明一统志》多舛误抵牾处，最为清人所讥刺，四库馆臣举其书“以唐临朐为汉县，辽无章宗而以陵在三河，金宣宗葬大梁而以陵在房山，以汉济北王兴居为东汉名宦，以箕子所封之朝鲜为在永平境内”，认为俱乖迕不合。然其书既一遵元人旧规，建置沿革固仍其中一重要部门。清人虽颇讥《大明一统志》，而所修的《大清一统志》，于各省统部及诸府和直隶州中，固皆先冠以图表，接着叙述分野，再接着就是建置沿革。而所追溯的建置沿革是从《禹贡》以后，历代变更皆稍无遗阙。更附以历代沿革表，则古今变迁可就以一览无遗了。

元、明、清三朝《一统志》皆为官修的地理书。其时私家著述亦富，成就不在官修以下。这里可以举出清初顾祖禹所著的《读史方舆纪要》。顾书凡一百三十卷。其前九卷皆论述历代州域形势。全书虽皆以论述形势为主，沿革建置却也相当详细。就是论述各省以及所属的府州，直至诸县，也都历历考